

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

• HENRY WILLIAM 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经济思想的成长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著

晏智杰 刘宇飞 王长青 蒋怀栋 译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思想的成長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

HENRY WILLIAM 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经济思想的成长 ①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著

晏智杰 刘宇飞 王长青 蒋怀栋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思想的成长 / (美) 斯皮格尔(Spiegel, H. W.) 著; 晏智杰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0

(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ISBN 7-5004-2456-6

I. 经… II. ①斯… ②晏… III. 经济思想史-研究-世界 IV. 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948 号

© 1991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郭媛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25 插页 4

字 数 1 070 千字

印 数 1 001—2 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上、下册)

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

编 委 会

顾问

陈岱孙(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肯尼斯·阿罗(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主编

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颖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执行编委

罗 涛 苏 剑 叶南奇 张 红

序 言

最近 20 年来,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迁,而且可以预期,还会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这种变迁呼唤着适当的经济理论来提供某种指导——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需要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无疑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同样,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更为广阔的经济视野,需要从更为多样化的经济实践中吸取营养。于是,西方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了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苦恼、阵痛、期望和奋斗历程都可能成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契机,都可能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素材、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而在原计划经济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保持转轨与发展并行不悖的国家。这使东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振奋。

为了深化我们对中国经济及其改革过程的理解,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素材和新的视角,加强中国与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和沟通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为此,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两个经济学院系的有关教学和研究人員准备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主要是把西方一流经济学院系正在使用的最新、最好的经济学教材译介到中国来。

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第一,层次高。本丛书所选书目均为中高级教材。第二,内容新。所选书目均为美国最近几年出版的教材,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水准。第三,题材广泛且具有系统性。大凡当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从基础理论到各专门学科,从理论、历史到方法,本译丛均有涉及。第四,选材权威。本译丛所选书目均经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有关经济学家严格挑选,都是美国经济学教材中的优秀之作,均出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手,并在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系广为使用。

这套《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包括高级和中级两个系列。高级系列覆

2 经济思想的成长

盖了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基础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对策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入选各书均为目前西方一流经济学院系所用的最新最好的研究生教材。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对读者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帮助,也希望对理解中国经济、从而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裨益。

译者的话

在国外新近问世的经济学史教科书中,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经济思想的成长》拥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这部篇幅宏大的著作于1971年问世,1983年增订再版,1991年出了增订第三版。我们是根据第三版译出的。

该书突出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自《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下至当代经济学迄今演变的各个阶段,皆在论述之列;举凡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发挥过一定影响的思潮、学派和人物,在这部著作中都有其一定的地位,轻重不同地显示了它们的踪迹。另一方面,作者在着重论述各时期各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同时,也给当时的各种反对派和非主流派以相当的篇幅,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一幅长卷的全景图。

其次是全书的论述很好地体现了综合与凝练相结合的原则。全书覆盖面广泛,涉及的时期久远,学派众多、人物成群,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纷纭驳杂,历史过程宏大曲折,但全书并不松散,反而体现了明显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保持了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力度。这主要得益于作者明确地用一根主线将它们贯串起来,加以整合。作者认为这根主线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学派和学者,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发展或财富增长问题。我认为作者的这一见解是很有根据的。另一方面,由于留给每个时期的每个学派或人物的空间有限,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顾此失彼、倚轻倚重。作者学识渊博、融会贯通,在着意于勾勒全局、框架和基于线索的同时,对于细节和要点往往点到为止,从而成功地做到了高度概括和重点深入的适当结合。

再次是全书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现在西方有些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著作,存在着单纯追求技术化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力求将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数学化,尽可能地用数学公式或语言去代替历史的陈述和文字的表述。这样做往往弊大于利。本书作者则强调把经济学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与不同时期的其他思潮联系起来,把经济思想史放到一定的经济、政治

2 经济思想的成长

和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必要时也不轻易放过某个人物的出身经历、性格爱好等方面的细节。这些无疑都增强了作为一部理论史的深度、可读性和吸引力。

此外,作者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内容非常丰富的参考文献,其中论列了有关的各种著作、论文,更可贵的是对它们大都作了注释性的说明,或指出其核心思想,或点出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或比较其各种版本的优劣长短和进退得失。这对读者(无论是大学生、研究生,还是研究者和教师)进一步的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鉴于此,我们把这些占了相当篇幅的参考文献也译出供参考。

至于作者的观点,相信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决定取舍。本来就不能要求或指望作者代我们立言,事实上作者的观点也不代表译者的看法,尤其在关于中国经济思想的篇幅不多的论述方面。但即使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苟同作者的看法,也不妨碍将它译介给我国读者,以扩大视野、启发思考、增进了解。本书是为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撰写的教材。我们相信该书对我国大学生、研究生、教师和对西方经济学说及其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会有所助益。

作者亨利·威廉·斯皮格尔是美利坚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在经济学说史方面,他还著有《美国经济思想的兴起》。参加翻译的是我指导的三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副教授刘宇飞和研究生王长青、蒋怀栋,由我进行全书译稿的修改和定稿。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译文的缺点或错误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晏智杰

1998年5月4日

北京大学百年华诞

前 言

加强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联系,并把经济思想史与不同时期的思潮联系起来,是我一贯的宗旨。这意味着我选择了一种文化的方法,而不是把早期思想转换为数学模型的技术方法。人物传记的细节被包括进来,也加强了本书的人文主义导向,并且增强了吸引人的魅力。而一旦关注时代精神和作家个人历史,便还有一番新的见地,洞察经济思想何以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某种转折。

本书试图将对不同时期的、特别是较早时期的论述统一起来,办法是系统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或他所在的学派,如何应对稀缺这一根本的经济问题呢?面对这一问题,在古代有些人主张限制对商品的需求;有些人建议实行公共控制或者推荐节制。同时也出现了认为稀缺可以通过在商品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采取措施来解决的观点,当然,这一观点是逐渐获得理论依据的。中世纪学者专注于消费者保护,视之为应付稀缺的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而重商主义者试图经由让别国付出代价的方式追求国家财富来解决问题;斯密主张自助;马尔萨斯主张自制。

对前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占了一定篇幅,因为它充溢着有关消费经济的各种选择,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

现代阶段论述的主旨具有综合性和世界性。相当多的注意力和空间给予了 20 世纪的经济学。过去 100 年间的经济学,有一个声誉卓著的第一阶段,最早关注给定数量资源的配置问题,本书在有关章节中专门讨论了杰文斯及其先驱者,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和剑桥学派,每章都以其最近的发展结束,比如,对剑桥学派一直讨论到垄断竞争、福利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收入方法。现代经济学的第二个阶段,即,货币和收入分析的突破,以凯恩斯的著作为例证,其思想可以追溯到剑桥和斯堪的纳维亚学派。第三个阶段,即,经济学转向计量经济学,在广泛的框架内进行了引证,注意到像冯·纽曼和沃尔德这些数学家的影响,也注意到法国的当代思潮,因为数理经济学发端于此,并且可能也会在那里发现新的方向。

2 经济思想的成长

本书是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编写的教材,如果用于两学期的课程,可以辅以一些列在第 667 页以下的配合读物,包括原著和释义;如果用于一学期的课程,可以少用配合读物,或者完全省却它们,第四、七、九和十五章中给出的材料可以精简的方式讲授,或者略去。

长篇注释性参考文献是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某些方便。

在此要向约翰·墨菲和已故的沃尔特·莫顿致以感激之情,他们对本书第一版的手稿慷慨地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本书的主体历经 20 个年头而无需改变,作者不禁为此感到自豪。在这第三版中,读者会发现新的导言(对经济学史作了总览),并概览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的文献,更新了书目文献和注释。新的导言从以下诸位的建议中得益良多,他们是 Dudley Dillard, Crauford D. W. Goodwin, Peter Newman, W. W. Rostow, Warren J. Samuels, 和 Walter Stettner,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于华盛顿特区

导言

经济学史总览

经济学史总览

[xiv]在向读者提供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各种细节之前,对经济学史提出一些总的看法是必要的。与一般历史或经济史不同,经济学史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思想。这样,吉本有关一般历史的说法就无法直接应用到思想史上了,吉本认为,历史“无非是人类罪恶、蠢行和不幸的记录而已”。而思想史其实只是在这些内容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

为其时代需要服务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史漫长的历程中,经济思想有时与一般历史(包括经济史)十分接近,有时又相当遥远。经济思想的首创者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在他们看来植根于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稀缺所引起的主要经济问题。这种情形在各个时代可能都是真的。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是经济思想家提供帮助的接受者呢?有些经济思想家主要将自己的主张向同时代人宣讲,包括他们的同胞或更宽泛的群体;而另一些经济思想家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都能保持有效。

那些确信其思想的有效性不受时间限制的绝对主义者或者赋予其思想本身、或者赋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一种绝对的特点。就前一种类型而言,他们相信,某些主张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或经济组织中都是有效的。经济学史中许多有声望的思想家持有这种观点,[xv]并且高度精致地发展了他们的论点。而另一类绝对主义者不能得到这样的恭维,他们无力对生活于

2 经济思想的成长

其中的并且是易于变化的历史环境加以具体描述,并在这一狭隘视野的基础上,传播其据说是有效性不受时间限制的主张。

抛开上述的极端类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家都是名副其实地服务于其时代的,即,他们的思想之形成正是为了适应其时代的特定条件。例如,17和18世纪重商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适应了长期混战中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亚当·斯密推崇和平与自由市场,指出其优点在于加速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并且(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打开了通向工业革命的道路。李嘉图和马克思在稍后的阶段从事著作,当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分配问题已变得更加紧迫了。尽管他们的分析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是,两人都把分配问题置于分析的中心。穆勒认识到需要保护某些社会成员免受自由放任政策的强烈影响,因而对自由放任原则保持一种有节制的支持。在西方世界,马克思设想和论及的那种革命从来没有发生,相反,为避免革命,改良者、社会立法者以及包括像俾斯麦和迪斯累利^①这样的头脑顽固的政治家却创造了现代福利或社会服务性质的国家。伴随着多种条件促进下当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以效用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转而将消费者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这一理论也为反对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再后来,凯恩斯渴望设计出克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政策而发展出了一种国民收入决定的一般理论。

经济知识的积累

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人的思想中学到和吸收一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经济思想的发展看做是逐渐进步的过程。这正如牛顿的那个著名的说法所指出的: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然而同样,其实,过去的遗产并非一成不变地总是幸事,它有可能变为一种负担。有些思想本来是适应某一特定年代而提出并服务于其特定目标的,却被错乱地用于另一时期并服务于它们并不适合的目标,此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种时代错乱的例子包括:将显然是旨在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已经充分发展了的民族国家;将支持农业价格的重农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农产品已出现剩余的世界;在经济现实的更为合适的解释是要求公共政策干预时,仍要求助于古典派的自由放任的教条;[xvi]在当代福利国家已成大势的条件下仍求助于马克思远在资本主义被各种政府干预

^① 迪斯累利,英国首相,1868年及1874—1880年在任。——译者注

措施驯服之前阐述的思想;在不发达国家采纳马克思提出的适用于当时高度发达国家的思想,等等。20世纪80年代英语国家中对于表面化的自由市场的崇拜也给有思想的观察家留下了时代错乱的印象。

使用过时的经济思想的机会会因年龄因素而增加,这形成了产生时代错乱的一种内在趋势,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的稳固性。像熊彼特和凯恩斯这样不同的思想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熊彼特称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的第三个十年为“神圣的不可超越的”十年,因为在他看来(见[579]),在这十年之中,创造力将达到此后年份再也不能达到的顶峰,此后他所能做的一切将只是润色和修饰他过去的观点而已。凯恩斯则从另一角度论及于此。在《通论》的结束语中,比熊彼特更进一步,他对于年龄超过“神圣十年”的人吸收新思想的能力表示了怀疑,他相信,在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的经济思想一旦被广为接受就已经趋于过时了。正如凯恩斯所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得到政见,但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并不重要的学者的思想中提取来的。”

另一种错乱是将某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思想反过头来运用于更早时期而不管它是否合适。一个有争议的例子是企图将过去的经济学大师的思想转译为今日所用的数学术语。尽管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毫无疑问都具有重大的洞察力——当然二者也许是不同的——但是今日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数理经济学只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之内就变得如此显要也是不争的事实。更早的时代并未对此作好准备,因为那时的经济学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明显差异,并且与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密切相关。只是在过去50年间才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并且在与其它因素共同作用下,接受数理经济学之风横扫世界,影响所及,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国民差异都抽象掉了。进而,人们很可以争辩道,对过去的大师们用文字表述的观点所进行的转译总是趋于使它变得浅薄,使之丧失思想的微妙深奥之处和书面文字细微的风格特征。事情的另一面可以举古诺为例,这位19世纪数理经济学的先驱者对人们对他的新思想缺少反应感到失望,因而把它们转译为文字描述,出版了一本著作,其中,他用文字阐明了在他的一本早期著作中曾用数学方式表述的观点,但仍然没有任何反响——这不是因为读者们发现他的思想过于新奇,而是因为古诺进行转述的结果是使他的思想显得过于琐碎了。

的确,文字的表述方式十分适合过去的大师们,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因为其思想的内容及其要旨,[xvii]而且也因为其文章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恰当与精妙而被人们牢记。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在学院课程所研究的“伟大著作”的清单中找到,在经济学史的教材中也不例外。本书

中,我们将遇到《圣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洛克、休谟、斯密和穆勒,他们都以其一流文章的神奇魅力而著称。凯恩斯也是一位值得称道的、风格独特的作家,可被纳入这一群体。

作为修辞学家的经济学家

如果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杰出的作家,那么,再自然不过的结论就是,他们也会拥有说服别人的可观的力量。由此引出了近年来对于经济学与修辞学之间关系的大量讨论,不过这里只能稍加触及。“修辞学”一词本身在这里没有任何贬义,它只是意味着个人说服力量的运用,并且它也被用于全部科学之中,无论是软科学还是硬科学。科学家们与公众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没有自发性和精神活动的机械的程序,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会话或交谈。

莎士比亚使用了两百种修辞手法,经济学家们用的没有这么多,主要是比喻和类比,以及求助于权威: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种数学程序,或者是其它的任何能够以其秩序和优美使读者满意的东西。修辞学的使用可以上溯到整个经济学史。柏拉图尽管表面上反对运用修辞学,并且以其作品所具备的美感的吸引力俘获读者的头脑,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还是充满了比喻,并且其中的对话特别适合于先发制人以及对来自读者的可能的反对做出答辩。中世纪学者求助于神的权威掌握读者的灵魂。重商主义者通过允诺权利和利润激发读者的想像力,同时使用在我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类比吸引其同时代人的注目。重农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诉诸人对自由的不可遏制的渴望。在对自由放任的诉求中,有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一些经济学家创造了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各种比喻,著名的例子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做出保证,要把人间变为天堂;许多现代经济分析尤其关心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达到的相距甚远的最优状况,虽然具有一种理想的吸引力,但却可能无从实现;数学的使用则有其自己的修辞手段:前提与假定,明显的精确性,科学的严密性以及和数字一起使用而带来的确定的感觉。

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的渗透造成了与过去之间的断裂,过去,经济学家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见解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但现在,经济学不再是一个有才气的门外汉可以轻易理解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有那些相当特殊的专家才可以把握,它已经变得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高度专业性,或者说,它已经变成了诸如武器系统的选择、军备控制和税法这样的晦涩难懂的学科了。

作为规律揭示者的经济学家

[xviii]使经济学家拥有特别有效的说服力的是他们对于多种规律的判断能力，这是另一个在这里只能稍加触及、一带而过的问题。某些经济规律可以上溯到古代，比如，格莱欣法则的要旨——劣币驱逐良币——阿里斯多芬早就知道了。某些规律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比如，康芒斯喜欢说：“经济学的第一法则是你不可能从无中生有来”，弗里德曼并非康芒斯的弟子，但人们认为他提出了大意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规律，有时，这一规律还可以归因于更早期的作者。

有效性不容变更的经济规律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例子是基于数学原理的瓦尔拉斯法则，而某些法则却明显是经验性的，亦即得自于观察。这包括谈及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之间关系的恩格尔定律和关于收入分配的帕累托定律，与厂商的增长有关的吉布拉特比例效应定律也是经验性的。经验法则的特性使它们只能具有或然的有效性。

还有供求法则、戈森定律以及一些关于人类行为的相关陈述，有许多来源或出处，但与其说它们像是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习俗那样据说是不可更改的，不如把它们看做是人们的一般倾向。尽管收益规律来自一种理论修定，但偶尔也被赋予经验的内容。古典学派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而一位早期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却支持一种在新大陆更有意义的报酬递增规律。某些规律只有在某些很少被提及的严格条件之下才有效，比如萨伊关于供给创造其自己的需求的著名的市场法则，严格说来就只有在易货贸易条件下才正确。其它一些规律则未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比如将工资与人口联系起来的工资铁律主要是在 19 世纪得出的。

经济学与权力角逐

工资铁律将工资增长与人口增长及劳动供给增长相联系，后者反过来又会引起工资的下降。依照该铁律，至少从长期来看，对更高工资的需求似乎就是自相矛盾和荒唐的。19 世纪的另一思想是关于工资基金的，这一思想旨在证明，可用于工资的货币总量是一笔固定的基金，因此，增加一个工人团体的工资就要求减少对另一个团体的支付。诸如此类的经济思想显然表明，经济思想可以被用作权力角逐的工具——这里所提到的例子

可以在工资谈判中作为增强雇主力量的工具。

运用经济思想增进权力的做法古已有之。[xix]柏拉图关于理想社会中劳动分工的思想导致他建议将这一社会置于一个哲学家—国王的统治之下，柏拉图自己愿意担当这一角色。事实上，通过旅行到西西里去帮助当地的统治者，柏拉图做过两次尝试，但都以悲剧告终。

到目前为止所给出的例证中，所谈到的权力限于一个社会内部的若干集团，可以举出其它的例证说明经济思想也可作为民族国家权力角逐的工具。比如重商主义，呼吁积累财富以增进国家的实力与安全，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通过创造一些有时不免陷于怪诞细节的规则和管制措施来促进出口和鼓励民族工业的强大，比如在英格兰，为加强羊毛产业的发展，规定死人必须身着毛制寿衣方可下葬。

在更近的时代里，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有时被描绘成利益被传递给了最强大和最为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一观点是由一些 19 世纪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得出的，他们把英国描绘成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主要受益者。20 世纪，欠发达国家的代言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将其运用于处理与高度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与意识形态

工资铁律和工资基金的支持者既不是心怀叵测之人，也不是专门的辩护者，他们都是善意的人，从某种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世界能够与其价值判断和哲学观点相协调。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解释自己观点的方式同某个人的解释受到友人嘲笑时做出的解释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相信友人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自我辩解发生在人们将结果归于虚构的原因时，这种原因可以使他们感到更加舒服或给他们带来其他的利益。雇主们可能自我辩解说，工资的上升对于劳动人民乃至对于整个经济都是坏事。有时，当一个人这样自我辩解时，就被认为是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一种哲学体系；在这里使用的特定的意义上，它可以被界定为某人对某些命题的科学性的判断，这些判断事实上是来自其哲学偏向、主观判断或物质利益的。

泛意识形态论者惯于到处发现意识形态，包括并且特别是在经济学史中发现意识形态。事实上，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划出分界线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一个观察者认为是科学的东西很可能被另一个人认为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为他以后意识形态分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断言，所有后李嘉